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一)

进入21世纪,一批70后“新生代”军旅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角,创作实力不容小觑。他们的创作覆盖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诗歌等各种文体,其中的佼佼者多次在全国性的文学评奖中折桂,部分作品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提名。

“新生代”军旅作家以其独特的审美体验与视角,观照着当代军人的生存境遇和情感状态,为新时代的军旅文学开拓了新的资源和面相。相较于前辈作家,他们更愿意聚焦高强度压力环境中的个体,表现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命运轨迹;在取材上,他们更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人物丰富而驳杂的生命情态和生活经验,对细节进行放大甚至夸张化处理,探索柔软敏感的人性与人物的内在心理;在叙事内容上,他们倾力展示平凡个体与世俗现实之间的种种纠葛,揭示青年军人在军营与社会的急速变化中所面对的精神处境和命运遭际;在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两个层面上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为21世纪初年的中国文学增添了一道别样而亮丽的风景。

(二)

“新生代”军旅作家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在处理现实题材时,习惯于以小见大,把生活改写成片段式的、具体可感的生命过程。

王凯在长篇小说新作《导弹和向日葵》中显示出开阔的精神视野和强大的叙事能力。他并没有沉溺于生活的窘迫和困惑本身,而是将尖锐的痛感转化为宽广、坚韧、通透的人生态度。他的文字充盈着厚重的现实经验和超拔的哲学思辨,似歌者般吟唱着军旅生活宏阔辽远、高蹈正大之气象。

董夏青青的小说极擅留白和经营意象。她对小说中的环境极其敏感,并不是大段地描写,只是在人物出场的时候不经意地点染那么几笔,而这几笔恰恰是短篇小说的精髓。她的短篇小说《在晚云上》,现实与历史交叉在会唱这条辽阔苍茫的叙事线上,不断的回叙、插叙也消解着现时态的诗意情境,白云苍狗,令人浮想联翩。

曾剑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小人物,讲述的也是寻常生活。他笔下的基层官兵,无论是身处恶劣的驻防条件,还是面对突发事故或生活的挫折考验,都没有沉溺于怨怒和自弃。他们不忘军人的责任和亲人的期望,在孤独中与自己对话,在寒冷中互相温暖,在平淡中积极进取。阳光洒进这些平凡士兵的心里,照亮他们的军旅生活,也温暖了读者的心。

“新生代”军旅作家在书写战争历史时,时常展现出极富现代性的文学观念,以当下的立场、感性的目光洞察历史的幽微和吊诡。

西元的小说《死亡重奏》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奖中获得中篇小说奖提名。小说以交响乐的音乐形式为结构,将不同的死亡情景和残酷的战斗画面,交织成一曲丰富而复杂的“死亡重奏”。小说对战争场面和人物内心的描写极富文学性,其华彩程度令人赞叹。西元极擅整合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将思想与精神寄寓其中,以象征和隐喻来提升小说的意义与思蕴。

李骏笔下的革命历史不夸饰、不隔膜,氤氲着一层生活的烟火气,充盈着生命的热力与温度。作者对革命老区沉实的风物掌故、风土人情的熟稔渗透迂旋于字里行间,精彩而动人的细节俯拾皆是。他的长篇小说《穿越苍茫》,呈现出人类内心深处极为隐秘而又细微的经验,对历史与生命、与生活、与生存的关系等等极富存在感的哲学命题进行了深入甚至严苛的探索与考量;将人心的坚韧、人性的高贵、信仰的坚定、生命的力量置于风雨如磐的历史背景之中,书写得真切感人,摇曳多姿。

在王甜的短篇小说《雾天的行军》中,两个追问历史真相的人遭遇了种种困顿与迷茫,荒诞的处境则隐喻着超越历史与现实的精神之境。历史与现实最终在两个人的内心世界达成和解——王甜在这个短篇中创造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小说意象。这种意象,使得作品具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更加为文坛瞩目。作为一个极富锐气、活力、实力的写作群体,他们以其独特的审美体验与视角,观照着当代军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情感;为新时代的军旅文学开拓了新的资源和面相,为21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新质的经验、形式和思想,为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留下了鲜活见证和深刻注脚。

9月19日至21日,由十三位青年军旅作家组成的解放军代表团出席了第八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彰显了军旅文学传承有人、赓续不竭的生机与希望。作为一个鲜艳夺目的存在,“新生代”军旅作家群值得文学界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

——编者

成熟,引起军内外文坛的关注。

(三)

当下的青年写作,总是显示出一种简单的性质和片面的倾向:每每将一种情感结构推向极端,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域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写作应该从狭窄的个人视域和封闭的内心世界走出来了,应该以一种客观的态度面对丰富驳杂的外部世界。客观性不仅意味着人物形象的精确和真实,更意味着写作伦理的强健和美学精神的开闢。对“新生代”军旅作家而言,同样需要警惕模式化、同质化的写作倾向,这种倾向会直接导致气象格局的狭小与持续生长的瓶颈。

“新生代”军旅作家亟待突破的瓶颈,首先是要切实提升认知与把握现实军旅生活的能力。现实主义堪称军旅文学的精神底色和写作传统,这也决定了军旅作家需要及时快捷地追踪、记录当下军营正在进行的变革。更高与更新这两个向度,不仅考验作家认识生活的能力,亦考验写实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的作品虽然写的是现实题材,但创作主体缺乏紧跟当下军队新变化、观察军营新情况的自觉意识,缺乏宏阔视野和整体性思维,缺乏穿透事象直达本质的锐利目光,导致作品所关注的并非是当下军旅生活中最震撼人心、最带有趋向性的景观,所传达的思想和意识并非是当前军队发展的主流,所塑造的人物并非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主体。

其次是沉溺于“形而下叙事”,缺乏宏阔辽远的审美气象。军旅文学的审美品格既要有沉郁悲壮,也要有昂扬向上;既要聚焦基层官兵的生存境遇,也要关注军队发展的整体趋势;需要有大视野、大气象、大境界。而部分“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反映的生活和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过于低矮、狭小、逼仄;执迷于对小挫折、小苦难、小悲剧、小故事的书写,这样就与当前波澜壮阔的强军兴军进程拉开了距离。“新生代”军旅作家需要跳脱渐成模式的文学经验,以宏阔辽远的审美表达,写出和平年代军队整体性的发展变化,塑造好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宏阔辽远的审美之境作为军旅文学独特审美品质的重要向度,需要“新生代”军旅作家进行深入开掘与探索。

再次,职业化的军人伦理与传统的牺牲奉献和英雄精神之间的张力与错位,是书写当下军旅生活的重要向度,而“新生代”军旅作家对此尚缺乏充分的文学自觉。有的作品过分抽离了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核,与地方作家的作品趋同,难以形成独特的审美趣味和精神品格。笔者认为,在当下军人伦理的诸多内涵中,还应凸显其独特性和英雄性。使命任务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军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生活内容都有着自身独特的属性——军人生而为战胜,要在战争和战争准备中追求其终极理想和价值。英雄叙事是军旅文学的精神底色,“新生代”军旅作家需要建构属于自己的、具有时代新质的英雄话语。

(四)

当前,改革强军的伟大征程如火如荼,题材的丰盈和信息的过剩,往往令人眼花缭乱。这其中既有史诗般波澜壮阔的时代跨越,亦有对个体军人而言必须承受的严苛考验。大的历史变革往往蓄存着出大作家、大作品的巨大势能,也积淀起文学素材的富矿。讲好新时代军旅故事不仅要及时地反映现实,更要积极地介入现实;不仅要生动描摹当下军人的心灵世界,更要彰显创新创造的时代新质。抵近军旅生活现场,“新生代”军旅作家需要拥有沉实具象的写实能力,需要持续跟踪并深刻把握现实生活的新变化,进而将笔触延伸至整个军队、社会、国家变革转型的时代脉搏上,塑造出具有改革勇气、责任担当和中国精神的新时代军人形象。

诚然,以文学的方式概括现实、穿透时代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但是我想,即便不能给现实生活的诸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至少也要写出迥然不同的生活经验;即便不能贡献整体性、超越性的思想智识,至少要具有思辨的眼光和立场;即便不能在形式上开掘创新,至少要趋近于高贵优雅的文学气质。惟其如此,“新生代”军旅作家才能突破局限和瓶颈,葆有未来发展的多向度和可能性。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赵依:

《人民文学》2018年第8期的中篇头题,刊发了王凯的新作《楼顶上的下土》。小说展现了王凯对军人内心的细致把握和对有意味之形式的自觉追求。

《楼顶上的下土》以军营日常生活为结构推进故事,聚焦连队主官与部分小人物,书写人事事实与职业伦理交织下的精神与心理。小与大、个人与集体、微观与宏观,多重辩证关系拓展了小说的生活幅面,从中断生发新意。《楼顶上的下土》在连队合编的大背景下,以指导员为中心视点,围绕干部的业务素质和担当意识铺展情节,看似平淡又互不相干的琐碎小事最终指向的是合编合心的总目标。

小说的结构呈发散性,题目与故事的关联更是值得玩味。小说的前半部分,楼顶上的下土——姜仆射,并不是叙事的核心。他若隐若现、形象模糊地出现在连队管理、任职分工以及军营内外的现实生活中。在王凯自然而然的铺叙中,读者率先通过李金贵、王军等人物,并围绕战士复员的现实逻辑建立起对指导员的信任感和同理心。及至小说的后半段,姜仆射作为故事里的“小”,形象逐渐凸显,与以“大”为重的指导员互为各自转变的线索,“大”“小”之辩将有关自我价值、个人权利与义务之间的权衡和盘托出。

姜仆射对个人尊严高度敏感,即便站岗睡觉犯错也无法接受辱骂式批评。尽管读者早已从指导员对待李金

萧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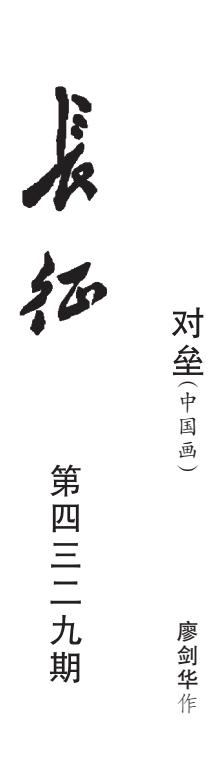
当个人主义在市场的“自由”中肆意嬉戏,当娱乐至上原则野蛮生长,文学将何去何从?如果军旅文学仅仅满足于书写穿着军装人的日常烟火故事,那些无尽的寂寞、漫长的航行、烈日严霜、草行露宿;那些悸动人心的同胞之谊;那些融化自我而合力铸造的人类奇观,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那些仍旧无法永别的武器……将在何种语境里实现自身的文学意义?军旅文学的尊严亦将怎样安放?

因此,军旅文学中心和正典的部分,理应保持一种庄严和肃穆。这肃穆或许带着一段哀伤或不安的尾巴,但重要的是屹立的姿态、光明的泽润。我在王凯小说集《沉默的中土》里,看出了军旅作家当仁不让的职责。是这职责让那些深植于战争与和平里、本属于人类的伟大和高贵,时至今日,仍留存于军旅文学正典所构筑的经典路径和坐标中。

连队,是王凯小说最重要的故事场景。士兵和连队的架构,容不下造作的编造。王凯笔下的连队,丝丝入扣般生长在他的身上。他历任学员、技术员、排长、参谋、干事,直至连队指导员,他是个优秀的部队基层干部。是的,他对连队了如指掌。

正是得益于这种深入骨髓的熟悉,他才能写出数不清的鲜活细节,在这些迷人的细节里,当代军人的形象得以坚实矗立。

职业军人有着超越常境的生存状态,“陌生化”伴着王凯秘境解说般清晰明澈的笔触,极大满足了读者的好奇



对垒(中国画)

廖创华作



军旅小说当有宏阔气象

——以王凯小说创作为例

贵的诸多细节里确认了他的尽职与善良,即便读者充分理解指导员寄希望于姜仆射实现转变时的苦口婆心,他们仍然普遍同情姜仆射的坚持。姜仆射是个兵,应以纪律为重,但他又有实实在在的性情与个性,正如小说里的话,“难题都是给有本事的人出的”。作家王凯抛出一个难题,在部队里,他首先是服从“大我”还是“小我”?指导员把楼顶上了锁,姜仆射失去了独处的空间,却也悄然开启了他迈向成熟老兵的大门。

王凯小说的结局从来不是大团圆意义上的,却往往是极其适合的好。现代社会里,军营中存在的现代意识该如何认知、理解?个人价值与自我实现以及对个性的尊重该如何获得?指导员从最初的点名和屋顶谈话过后,就决心将姜仆射这位“神仙”请下神坛,但最终,指导员的多番尝试还是宣告失败。他在结尾处也耐人寻味地自嘲起来,指导员始终不能从屋顶上的枯燥景观中捕捉姜仆射所觉察到的诗意,复杂精微的矛盾以一种审美意识的差距被具象地表达出来。这或许是最好的调和,人格发育、个人道德与社会伦理潜藏于军营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不能凭借一种对自我的完全丧失融入集体,而集体也无法容纳全无任何妥协的个人。

王凯擅于描写当下军人的现实生活 and 内心世界,以普通军人关于军人职业与生命本质的思考彰显理想主义情怀与英雄主义情结。现代生活的庸常经验多少削弱了军旅生活的传奇与诗性,在《楼顶上的下土》中,王凯选择直陈专业名词和相关术语。日常化的简约语调,避免因艰深晦涩产生的阅读负担,又在陌生疏离中彰显了军人职业的荣光,并以此

心。他能让你洞悉连队繁复细碎的规则,于是你可以融入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

小说家的敏锐加上对具体事务的稔熟,显然达到了切近真实的程度。这种手术刀般的理智色彩,和连队质朴的草根情谊,让叙事更为丰富沉着。在连队的日常生活中构筑高尚的人性、人格,他选择主动担当且默默牺牲。这些“正能量”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不可攀。伟大原本就从平凡生长而来,而最平凡的故事就在连队里。在连队里,王凯为心动和震撼还原了一个自然而体面的理由。在这里,理解他人、体认自我、骄傲和感动都变得如此体面而有尊严。

在连队的门岗外,往往就是一座县城。既不是大都市,也并非小乡村,这倒是让“县城”变成一个恰切美妙的隐喻。经由县城,《沉默的中土》传递出直截了当的现代气息,就在此刻当下,高尚正在发生。这种精神的“屹立”具有坚实的说服力。

王凯就这么走出门岗,点上烟,走进“大漠香”饭店,在进食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和精神的孤寂。小说中的人物总是怀疑自己谈了一场虚假的恋爱,却始终不曾忘记青春的理想和肩负的职责。

王凯让小说中的人物都拥抱了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这失败沉甸而富有机理。当我们读到小说结尾,当我们跟着指导员王凯一起,为他们焦头烂额、绞尽脑汁,用尽全力在现世挣扎、辩解、奔波、运作,却仍旧得到这颗失败之果之时,另一个与其相称的东西显露了出来,那就

勾勒出故事背景的清晰可感。

同样的,小说里有关姜仆射“高烧”的情节设置延续了王凯将医学心理学介入小说的表现手法。我们由此洞悉作家创作行为上的自觉及其学养,在解决小说艺术危机等方面的精神效果。心理学与王凯小说里关联的内心救赎和人性伦理等精神困局颇具关联,而浓郁的抒情意味也与人文意义上的心灵建构一脉相承。

王凯的写作正是以对某种边缘性存在的观照显示出独特的理性力与判断力。生活化的语言、平静的叙述,透视出作家对军营生活现实的细致探索,这也成为其小说破解军旅文学写作惯性的重要关节——军人作为普通人的的人性光辉、军旅小说作为题材创作的文学性,个体内在世界的呈现不依赖宏大历史和时代背景的营造,而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恰如其分地展现出独特的文学品质;不停地将故事人物置于困境之中,在解决困境的同时提供更为本质的反观视角,以小人物内心的现代性焦虑激发读者关于伦理、责任、自我与他人等关系的思辨与探寻。

这种创作趋向不断拉近读者与特定题材文学之间的距离,青年小说家亦有责任以文学的新气象实现对既有写作模式和审美经验的超越。对诸如强军文化、军人格局、职业荣光、英雄情怀等等复杂的精神性存在,军旅小说都要给予精微的探寻和宏阔的呈现。“小”与“大”并不矛盾,而是统一于现代军营的独特场域里。我们喜爱军营里小人物内心独白的真实可感,更呼唤有灵魂、有血性的史诗式叙事和深植其中的爱国情怀、英雄气概以及生命哲学的重建。

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高贵。

失败是当头一棒,是清醒的起点,是从死地重新萌芽的可能性,是最后一顶意义的桂冠。军旅正典以其集体主义的惯性,应首先其冲地戴上这顶意义的桂冠。它不够华丽,却饱含深意:失败的李二明留下一颗烧黑了的铜质军装纽扣,“‘八一’军徽仍清晰可辨”;失败的魏登科在尘封的蓝皮本上被记录,被重新翻看、阅读;失败的周文明则把热泪盈眶的送别场面刻在了读者心里。“我看到他飞快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个东西递给我,一瞬间,我的指尖传递出炸馒头片的形状和春天般的暖意。”

高洋从优质的中队长开始,不厌其烦地一路堕落。我们对他反复摇头,反复失望,直至“沙丘上腾起一团橘黄色的火光”。在世俗意义上失败的高洋,王凯让他在精神的世界里拥有非同凡响的结局。

用失败照耀伟大,是对伟大含蓄而深沉的奖赏。王凯笔下的士兵、军官,很像钱德勒笔下的马洛。他们带着一种深刻的正能量,一种悲观的温柔,一种让读者着迷的气质。

军旅文学的正典,或许也该加上一条,那就是让女读者“爱上”军人。在军营这个讲求牺牲奉献、以苦为乐的独特场域,生出一股纯正的浪漫激情。在小人物看似失败的足音里,我们足以听到军人人格胜利的交响。

军旅小说中流砥柱的部分,不允许松散和溃败。军旅正典是参照系,亦是岿然不动的标尺。